

# 现代科学观视域下的清学研究 及其方法论得失

——以新考据派史家胡适、傅斯年为中心

徐国利

DOI:10.16240/j.cnki.1002-3976.2017.02.021

**摘要** 胡适、傅斯年从进化史观角度,以近现代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清代学术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胡适认为,清学是对宋学科学方法论的发扬,两者是一脉相承的;清代朴学最具科学精神,但与西方科学相比则存在很大不足。傅斯年主张,清代学问是历代学问中最可信和最有条理的;近代中国史学盛于清代。他们着力发掘清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传统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为中国现代学术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探讨其学术方法论的得失对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 现代科学观 胡适 傅斯年 清学 方法论

清代学术(简称清学)是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最后阶段,中国现代诸多史学流派和史家从不同视域出发,对清学做了评判,其中新考据派史家所做贡献颇多。笔者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新考据派当以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垣等为代表。他们推崇清代学术,视其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最高峰或最有价值者,这是将他们归为新考据派的根本依据所在<sup>①</sup>。其中,胡适和傅斯年从进化史观的角度,以近现代<sup>②</sup>科学方法论和史学观为依据对清学进行考察评述,着力发掘其科学精神和方法论意义,并以之作为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传统资源,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观,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忽视乃至否认中国传统学术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意义,是一种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探讨其学

术方法论的得失对中国当代学术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sup>①</sup> 学术界对新考据派的认知存在分歧。有学者说,新考据派是20世纪上半期史学派别之一,包括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以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皆是在胡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口号下创生的(张岱年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9页)。董恩强主张,新考据派亦曰“史料学派”,是指民国时期具有新观念,重视新材料,注重实证的学者,以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陈垣、陈寅恪、李济等为代表(董恩强:《平等的眼光:民国新派学人的史料观(1919—1949)》,《福建论坛》2007年第12期)。许冠三认为,“新考据学派”包括方法学派和史料学派,其中,方法学派代表人物为胡适、顾颉刚,史料学派代表人物为傅斯年、陈寅恪(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页)。笔者认为,陈寅恪推崇宋学而鄙薄清学,王国维主张学无中西新旧,对清代学术的推崇主要是金石学,且持保守的文化观,故不应将他们归入新考据派。

<sup>②</sup> 胡适多用“现代(史)”的概念,傅斯年则多用“近代(史)”的概念。

## 一、胡适：现代科学方法论和精神视域下的清学

胡适终生以传播和建立中国现代学术科学方法论为己任，他倡导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在评述清学时便以科学方法论为视域，称其最富科学精神，却又未达到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的水平，成就有限。

(一)清学是对宋学科学方法论的发扬，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以进化史观来考察中国学术史，指出清代学术在方法上是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科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扬，清学与宋学实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以科学方法的发现和建立为主线，将中国思想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古典时期，从公元前第一个一千年直到汉代，“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创造性、最有原始性的固有思想时代”；此后，从两汉统一进入分裂时期，即“中古期”；第三个时期是现代期，从公元一千年（北宋初期）开始，可称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胡适指出，宋儒最重要的贡献是在儒家经典《大学》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格物”，“‘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这就是培根所说的‘新工具’；也就是笛卡尔所提倡的‘方法论’”<sup>①</sup>。他认为，“格物致知”方法论被提出来，“方才算是寻得了中国近世哲学的方法论”<sup>②</sup>，开中国现代科学方法之先河。

清代学术是对宋儒提出的科学方法的新发展。胡适认为：“这个风气一开，中间虽有陆、王的反科学的有力运动，终不能阻止这个科学的路重现而大盛于最近三百年。”<sup>③</sup>因此，他反对梁启超等人“清学是对宋学反动”的观点，指出清学实是对宋学精神的继承。清儒排斥宋儒，“然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也实在是朱熹、黄震、王应麟的嫡传子孙”，所以从历史上来看，“清代的汉学其实也只是一种新宋学”<sup>④</sup>。他还对清代朴学与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间演变的关系做了阐述：“程朱的归纳手续，经过陆王一派的解放，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解放后的思想，重新又采取程朱的归纳精神，重新经过一番‘朴学’的训练，于是有清代学者的科学方法出现，这又是中国学术史的一大转机。”<sup>⑤</sup>胡适晚年对此问题又做了新论

述，把清代考据学的形成视为宋代以来学术累积的产物，“所以近三百年来这种批判研究的学术——如研究有关古籍版本的真伪，和内容的正讹的‘校勘学’；和研究古籍中文字的原义的‘训诂学’等等——都有了更迅速的发展。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更发展出一个较概括的学术名词叫‘考据学’或‘考证学’”。他进而指出，朱熹的科学批判性、怀疑精神和治学方法论为清代学术奠定了基础，“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他对古代典籍深具批判能力。朱熹也是研究古音韵的急先锋。他开始怀疑‘书经’中大部都是伪作；平时对古籍的处理也完全不拘泥于传统；每每使用新方法，另创新论。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我国自十七世纪其后凡三百年的学术研究，实在并不是反对朱熹和宋学；相反的，近三百年来学者，实是承继了朱子治学的精神。这也是个崭新的观点！”<sup>⑥</sup>胡适的认识超越了有清以来汉宋对立的各种学术观点，自成一言之言。

(二)清代朴学最富科学精神及其缺陷

胡适对清代朴学做了高度评价，称：“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sup>⑦</sup>。因为清代朴学善于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是真正的科学方法，在古代史料整理上取得了重要成就。不过胡适同时指出，与西方科学相比，它没能正确看待方法与材料的关系，治学只限于纸上材料，缺乏现代科学实验（实证）的方法，成就又相当有限。

清代学者将归纳与演绎相结合，善于运用假设，形成了真正的科学方法。胡适说，朴学主要涉及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订学，其根本观念主要包括：（1）研究古书，并非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每立一种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2）汉学家的“证

① 胡适：《胡适的自传》，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278、280、281页。

②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81页。

③ 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胡适文存》二集，第179页。

④ 胡适：《费经虞与费密》，载《胡适文存》二集，第53页。

⑤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一集，第285页。

⑥ 胡适：《胡适的自传》，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29、283页。

⑦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一集，第285页。

据”完全是“例证”；(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sup>①</sup>。假设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使归纳法被运用时格外经济和省力,因为归纳法并不是教人观察“凡天下之物”,“归纳法的真义在于教人‘举例’,在于使人于乱七八糟的事物里面寻出一些‘类似的事物’。当他‘举例’时,心里必已有了一种假设”<sup>②</sup>。所以,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主要包括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戴震所说的“‘但宜推求,勿为株守’八个字是清学的真精神”<sup>③</sup>。程朱理学“格物致知”强调归纳,陆王心学重视演绎,直到清代朴学才将两者相结合,使之成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并取得了重要学术成就。胡适认为:“西洋这三百年的自然科学都是这种方法的业绩;中国这三百年的朴学也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sup>④</sup>

清代朴学实为一场“史学的运动”,目标是建立新理学。胡适指出,十七八世纪是反理学时期,“风气所趋,遂成了一个‘朴学’时代,大家都不讲哲学了。……‘朴学’是做‘实事求是’的工夫,用证据作基础,考订一切古文化。其实这是一个史学的运动,是中国古文化的新研究,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其目的是要建立“新理学”,戴震用考证的方法和历史的眼光,“重新估定五百年的理学的价值,打倒旧的理学,而建立新的理学。是为近世哲学的中兴”<sup>⑤</sup>。胡适是把朴学放在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和重建中国哲学的高度来阐释的,称它是具有“史学意义”的儒学,即新理学的重建,这是胡适对清代学术及戴震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见解。

同时,胡适亦指出了清代朴学的局限性,认为清代朴学未能正确看待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不会运用现代科学实验的方法。治学方法与材料关系密切,“不但材料规定了学术的范围,材料并且可以大大地影响方法的本身”;“纸上的材料只能产生考据的方法;考据的方法只是被动的运用材料。自然科学的材料却可以产生实验的方法;实验便不受现成材料的拘束”。而且,“纸上的学问也不是单靠材料去研究的。单有精密的方法是不够用的。材料可以限死方法,材料也可以帮助方法。三百年的古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几千年的古史

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上”。因此,“单学得一个方法是不够的;最要紧的关头是你用什么材料”<sup>⑥</sup>。

朴学只限于纸上材料,且缺乏现代科学实验的方法,故其成就难以与西方现代科学方法相比。胡适指出,中国近世学术除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是一些纸上的学问,而西方学术已走上自然科学的大路,“顾炎武、阎若璩规定了中国的学术的局面;葛利略、解白勒、波耳、牛敦规定了西洋三百年的学术的局面”。两者的方法是相同的,但材料完全不同,“顾氏、阎氏的材料完全是文字的,葛利略一班人的材料完全是实物的。文字的材料有限,钻来钻去,总不出这故纸堆的范围;故三百年的中国学术的最大成绩不过是两大部《皇清经解》而已”。即使在朴学最有成就的音韵学上,由于西方学者善用科学方法和实验,成就也远远胜出,“一个格林姆(Grimm)便抵得许多钱大昕、孔广森的成绩。他们研究音韵的转弯,文字的材料之外,还要实地考察各国各地的方言,和人身发音的器官。由实地的考察,归纳成种种通则,故能成为有系统的科学”<sup>⑦</sup>。他特别推崇瑞典珂罗偲伦《切韵》的成就,称其“可算是上集三百年古音研究之大成,而下开后来无穷学者的新门径”<sup>⑧</sup>。

## 二、傅斯年:现代科学观和史学观视角下的清学

傅斯年提出了著名的“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主张用科学方法来搜集、整理和编辑史料,认为近代学术的价值即在于科学方法的运用。他运用科学方

①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一集,第287~288页。

②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一集,第293页。

③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载《胡适文存》一集,第298、300页。

④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胡适文存》三集,第93页。

⑤ 胡适:《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载《胡适文存》三集,第66、67页。

⑥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胡适文存》三集,第98、101~102页。

⑦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胡适文存》三集,第97、101页。

⑧ 胡适:《〈左传真伪〉的提要与批评》,载《胡适文存》三集,第138页。

法全面考察了清代学术,特别是对清代史学颇多阐述,指出清代学问是最可信和最有条理的,清代史学达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最高峰。

(一)清代学问是历代学问中最可信和最有条理的

傅斯年以现代科学观为依据,对清代的学术发展、学术精神、学术贡献、清代学术与宋学的关系、清代学术的流派及其近代转向做了较系统的阐述。

关于清学与宋学的关系,在“五四”时期,傅斯年认为,清代的学问“只是宋明学问的反动,很像西洋 Renaissance 时代的学问,正对着中世的学问而发”,“清代学问是中国思想最后的出产品。在汉朝以后,出产的各种学问中,算是最切实最有条理的”<sup>①</sup>。清代学问是宋明学问的反动可以戴东原的“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为证。因此,清学与宋学是对立的两极。傅斯年指出:“宋明的学问是主观的,清代的学问是客观的;宋明的学问是演绎的,清代的学问是归纳的;宋明的学问是悟的,清代的学问是证的;宋明的学问是理想的,清代的学问是经验的;宋明的学问是独断的,清代的学问是怀疑的。”因此,“清代的学问,很有一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西洋人曾经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在整理古事物上”<sup>②</sup>。到 20 世纪 40 年代傅斯年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清代朴学虽然攻击程朱理学,立场却实与之相近。朱子学虽然倡导“尊德性”与“道问学”,本质却是重“道问学”,故实为“物学”,清代朴学的重要经学问题都得自宋儒。他说:“朱子之究心训诂,名物,礼数,一如清代朴学家,‘物学’之采色极重。朱子门人及其支裔诚多舍此但讲性命者。然东发、深宁竟为清代朴学之远祖。此不磨之事实也。清代朴学家之最大贡献,语学耳(兼训诂音声),至于经学中之大题,每得自宋儒”,“清代朴学家之立场,岂非去朱子为近”<sup>③</sup>。可见,傅斯年对朴学与宋学的关系认识虽有变化,但评价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以现代科学观与方法论为依据的,其早期称清学与宋学对立,是指清学是科学的,宋学是不科学的;后来主张清学与朱子学立场相近,亦是指朱子学的“道问学”是科学方法,其研究开启朴学研究之先河。

傅斯年还用进化论考察清代的学术流派、学术演变和近代转向。他将清代学术分成四派:一是朴

学派,是清学里最大的一派;二是今文学派,即从孔广森、庄存与到康有为一派;三是理学派,只包括颜习斋、李刚主等两三人;四是浙东学派,有黄梨洲、万氏兄弟、全谢山、章实斋等。王船山、陈兰甫虽不能算浙东学派,可学问上有非常相同之论,当归为一派<sup>④</sup>。他还主张将清学发展分为五期:一为胚胎期,从王应麟到焦竑,清以前的朴学先进都归在这一时期;二为发展期,从顾亭林到江慎修的时代;三为极盛期,是钱晓徵、戴东原、段懋堂、王怀祖的时代;四为再变期,是从孔众仲到俞曲园的时代;五为结束期,以康有为和章太炎为代表。他说:“这都是中国的学艺再兴时代的各阶级。前三期是遵着一条线而行的;第四期是前三期的反动;朴学派的发达已经极圆满了,大家觉着他难以复加,又觉着他烦琐无用的可厌,所以才能别辟一条道路。第五期是结束第二、第三两期的;太炎先生结束第三期,康有为结束第四期。”到第五期后,由于古文、今文学已经自成系统,加上西洋学问渐渐引介到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说是中国的学艺再兴时代”<sup>⑤</sup>。

傅斯年以现代科学的怀疑和实证精神评述了清代学术的价值、意义和地位。他指出,清代学问精神具有二重性:消极的方面是怀疑,这怀疑恰成一串,疑宋儒、疑伪古文、疑古文、疑今文,结果便疑孔子,“于是乎百家平等了……于是乎容纳印度化、西洋化了”;“积极的方面是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用着归纳的方法,取得无数的材料,翻来覆去,仔细考索,求异求同——这真是条好教训”。清朝学问的意义,“第一是求知,因为知识培养心意(朴学家的作用,只是求知。戴东原说,学问养其心知);第二是求实用(这是颜、李一派);第三是求实用(这是今文学派主

①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傅斯年集》,花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57 页。

②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傅斯年集》,第 58~59 页。

③ 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载《傅斯年全集》第 2 卷,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1 页。

④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傅斯年集》,第 59~60 页。

⑤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傅斯年集》,第 60~61 页。

义)”。所以,“清代学问在中国历朝的各派学问中,竟是比较的最可信、最有条理的”<sup>①</sup>。现代学者要整理中国历史上的学问、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自然要吸收西方的研究方法,但“必须用清朴学家的精神才能成功”<sup>②</sup>。

## (二)近代中国史学盛于清代

对于近代史学,傅斯年提出了“近代中国的语言学和史学,开创于赵宋,近三百年来成绩很大”<sup>③</sup>的重要观点。他运用“史学便是史料学”理论对清代史学加以评析,指出其史料考据和整理运用了和西方相同的方法,极大扩充了史料,取得了和西方语言学、史学类似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史学的高峰。

首先,清学是对宋学的发扬光大。傅斯年高度肯定宋代史学、尤其是司马光《通鉴考异》在史料考订和整理上的成就,称其开中国近代史学之先河,在西洋,“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sup>④</sup>。他指出,清代和近代史学以纸质文献与金石文献比勘互证始于宋代,“北宋人的史学分析工夫到这个地步,所以才能有《唐书》、《通鉴》那样的制作。到了近代顾亭林、朱竹垞等,以石文校史书,时有精论,而钱竹汀‘乃尽……出其上,遂为古今金石学之冠’。廿一史之考异,金石文之跋尾,皆同一意义之工作”。他甚至认为:“最近三十年中,缪荃荪、罗振玉、王国维皆于石刻与史传之校正工夫上续有所贡献,然其造诣之最高点,亦不过如钱竹汀而已。”<sup>⑤</sup>他强调,史语所的治史宗旨和方法亦是对此方法的继承,“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史立点”<sup>⑥</sup>。

其次,清代史学已具有近代西方语言学和史学的性质。傅斯年说,近代史学便是史料学,便是语言学,因为,“本来语言即是思想,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sup>⑦</sup>。易言之,只有通过文献史料中语言文字的考订、训诂和解释,才能明白史料包含的思想信息,才能还原客观的历史。他说,欧洲“历史学和语言学发达甚后”,中国却“发达甚早”,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到宋代,语言学和史学获得了大发展,“照这样进化到明朝,应可以有当代欧洲的局面了,不幸胡元之乱,明朝人之浮夸,不特不进步,或者退步了”。到清代,出现了最具近代性的史学,“顾

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辨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sup>⑧</sup>。

不过,清代史学也存在严重局限性。傅斯年强调,判定近代史学的进步有三条标准:(1)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2)凡一种学问能扩张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3)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sup>⑨</sup>。以此衡量,“除几个例外算,近几世中中国语言学和史学实不大进步”。他认为,清代史学的成就主要是直接研究材料,“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他们搜寻金石刻文以考证史事,亲看地势以察古地名。亭林于语言按照时和地变迁的这一个观念看得颇清楚,百诗于文籍考订上成那末一个伟大的模范著作,都是能利用旧的新的材料,客观的处理实在问题,因解决之问题更生新问题,因问题之解决更要求多项的材料”<sup>⑩</sup>。但清代史学在扩张材料和新工具上却存在严重不足,近代史学已成为各种科学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顾亭

①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傅斯年集》,第61~62页。

② 傅斯年:《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载《傅斯年集》,第64页。

③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④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讲史学》,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⑤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7~18、19页。

⑥ 傅斯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载《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335页。

⑦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0页。

⑧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0~181页。

⑨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2~183页。

⑩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4~185页。

林研究历史事迹时自己观察地形,这意思虽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洋人借来的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成绩岂不更卓越呢?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sup>①</sup>。

### 三、胡适、傅斯年清学研究的科学观、方法论及其启示

综上所述,胡适和傅斯年考察清学的视角和方法虽有差异,但都以近现代科学的进化史观和方法论为视域,是一种科学的工具理性思维。他们希望通过清学中科学精神和方法论资源的发掘,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提供现代科学方法论。但是,由于他们忽视价值理性对中国现代学术建构的重要作用,存在一定的理论缺陷,具有唯科学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其理论得失对当代中国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 (一) 胡适、傅斯年清学研究的科学观与方法论

如上所述,胡适和傅斯年均从进化史观出发,视清学为宋学的继承和发展,其进化的动力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史就是科学精神和方法萌发、曲折演进的历史,并以此评判清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及其与宋学的关系。在经学层面,清代朴学之所以达到传统学术的最高峰,或是因其“确有‘科学’的精神”(胡适),或是因其“最可信、最有条理”(傅斯年)。在史学层面,傅斯年以“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近代史学观来衡量清代史学,认为近代中国史学“开创于赵宋,近三百年成绩很大”,其治史方法甚至可与西方近代的兰克和莫母森相比拟。

他们都认为进化论是现代科学的产物,并以此考察学术思想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学术进化观。胡适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新哲学是19世纪科学进步的产物,作为其两个根本观念之一的“历史的态度”即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物,“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这就是要研究事务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种历史的态度便是实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元素”<sup>②</sup>。傅斯年也把达尔文进化论视为根本性的方法,他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

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围,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sup>③</sup>。

在方法论方面,两人所说不尽相同。胡适推崇的科学方法论主要是杜威的实验(实用)主义。他说,哲学就是科学方法论,其最新成就便是实验哲学,尤其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实验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历史的态度,“这两个基本观念都是十九世纪科学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实验主义不过是科学方法在哲学上的应用”<sup>④</sup>。他往往又把科学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sup>⑤</sup>。实际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科学实验室的态度”的具体展开,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实验主义对史学同样适用。他说,历史科学和实验科学的不同,“只是历史科学里的‘证据’无法复制。历史科学家只有去寻找证据;他们不能(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sup>⑥</sup>。

傅斯年的方法论主要是“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近代史学观,它实质是一套搜集、整理和编纂史料的方法论体系,是借鉴德国兰克学派等实证史学的产物。其“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命题主要包括三层意思,同时也是史学研究依次递进的三个步骤的工作:(1)史学的进步依赖史料的发现与扩张。“可见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新史料之发见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sup>⑦</sup>。这实际是指史学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即不断发现和搜集各种史料。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史学的发展。(2)史学便是通过史料的整理和比较研究,以还原和呈现历史事实。他主张,“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而整理史料的方法,

①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4页。

② 胡适:《实验主义》,载《胡适文存》一集,第216页。

③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0页。

④ 胡适:《实验主义》,载《胡适文存》一集,第216页。

⑤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载《胡适文存》三集,第93页。

⑥ 胡适:《胡适的自传》,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98页。

⑦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讲史学》,第21、22页。

“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sup>①</sup>。通过对各类史料进行比较,校勘其真伪,考订其史实,最终还原和呈现历史事实。(3)史学只是史料编纂学。他认为:“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sup>②</sup>即在史料搜集、校勘和考订工作完成后,对最能反映历史真实性的史料加以编纂,史学的工作和任务至此完成。在傅斯年看来,只有具备这些内涵和操作程序的史学才是近代意义的科学史学。

## (二)胡适、傅斯年治史方法的理论得失及其启示

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最后阶段,中国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与之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界研究的重大问题之一。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科学化的领军人物,胡适和傅斯年希望通过对清学的研究,发掘其内在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资源,阐释其蕴涵的现代性价值,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提供历史依据和理论证明。

胡适认为科学方法无东西之分,“科学的法则只是把常识上的法则纪律化而已。……事实上治学方法,东西双方原是一致的”。“‘考据’或‘考证’的意义便是‘有证据的探讨’。我说有证据的探讨一直就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一切历史科学(所共用)的治学方法”。在谈到杜威实用主义时,他说:“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sup>③</sup>另一方面,胡适却认为中国学术缺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如“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sup>④</sup>。在他看来,即便是像清学这样具有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学术,与西方学术相比,依然存在严重不足。因此,他试图通过引介西方现代科学观、方法论,在发掘清学现代性资源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现代学术,故而他有时将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学的事业称为“新汉学”,并视之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革命。他晚年曾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把汉学研究的范围扩大,本来也是我个人野心的主要

目标”<sup>⑤</sup>。

傅斯年则主张,“所谓方法,无所谓新旧”,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进步,“常有新观念新方法产生”<sup>⑥</sup>。东西方学术发展道路是相同的,而且古代中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他指出:“论到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的发达是很引人寻思的。西历纪元前两世纪的司马迁,能那样子传信存疑以别史料,能作八书,能排比列国的纪年,能有若干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家还近代些。”<sup>⑦</sup>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却落后了,清代学术虽然具有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却无法与完全运用科学方法的近代西方学术相比。所以,必须在继承清代学术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方法论来建立中国近代学术。因此,他一方面把清代朴学的治学方法作为史语所的第一条宗旨:“我们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正因为觉得亭林百诗在很早的时代已经使用最近代的手段,他们的历史学和语言学都是照着材料的分量出货物的”<sup>⑧</sup>;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近代学术必须是超越“正统汉学”的“科学的东方学”。他强调,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立的目的,“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sup>⑨</sup>。“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sup>⑩</sup>

胡适和傅斯年为包括史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胡适传播的实用主义方法论在中国现代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思想及其创建“科学的

①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讲史学》,第2页。

② 傅斯年:《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载《傅斯年全集》第3卷,第156页。

③ 胡适:《胡适的自传》,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110、198、109页。

④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⑤ 胡适:《胡适的自传》,载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262页。

⑥ 傅斯年:《考古学的新方法》,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59页。

⑦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0~181页。

⑧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4页。

⑨ 傅斯年:《致王献唐》,载《傅斯年全集》第7卷,第92页。

⑩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讲史学》,第188页。

东方学”也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里不再赘述。然而,他们上述思想和实践具有典型的“工具理性”倾向,无视甚至否定“价值理性”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马克斯·韦伯提出关于人的社会行动的基本概念。所谓工具理性,即“它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用作‘条件’或者‘手段’,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和特定目标”<sup>①</sup>。工具理性不看重行动本身的价值,而看重行动能否成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及其选择的手段是否最有效率,因此也被称为“功效理性”或“效率理性”,它关注的是客观世界。所谓价值理性,即“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无论该价值是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还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管其成败与否”<sup>②</sup>。价值理性只看重行为的“绝对价值”,即行为自身的价值,不计较手段和后果,它关注的是人文世界,尤其是道德精神世界,故亦被称为“道德理性”。

两种理性是人和社会都具有的。不过,西方历史、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本质上是在工具理性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其表现就是科学主导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使西方实现现代化。工具理性的运用对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一般地说,工具理性兴起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现代化进程来说都是必要的,当一个社会的基本发展目标确定之后,张扬并运用工具理性便至关重要”<sup>③</sup>。它不仅带来了社会器物层面的变化,创造了以往任何时代不可比拟的物质成就,也创造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但是,片面强调工具理性,甚至主张唯工具理性论,以至价值理性被遮蔽,也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和危机。“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显著效用极大地强化了它的合法性,使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工具的范畴,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衡量、规范和裁判人类行为合理性最权威的标准,甚至逐渐取代了价值尺度,成为一种崇拜或信仰的对象。……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正是现代科学危机的症结之一,也是现代社会陷入精神危机的根源之所在”<sup>④</sup>。从19世纪晚期开始,西方一些思

想家如尼采就开始批判西方工具理性文明。进入20世纪,这种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强烈,韦伯较早地注意到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张扬的倾向。在当代,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对其都有深刻批判。

在东西方历史发展中,两种理性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存在着很大差异。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更看重道德理性,可以说,中国历史文化是在人文道德理性的主导下发展起来的。进入近代,由于受到西方的全面冲击,中国步入了学习西方的历史进程,其表现就是实现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科学和民主的现代化过程;在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主要表现为西方文化中心论和全盘西化论。

胡适和傅斯年以现代科学观和方法论对清学的评判无疑是以工具理性为原则和依据的,他们眼中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实为西方科学观视域下的学术思想史,其传统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被轻蔑地排除了。如他们对清学及其与宋学关系的阐述是只见其“道问学”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而无视其“尊德性”的道德精神和人文传统。他们以工具理性的科学方法论为唯一方法建构中国现代学术。在他们看来,科学可以解决包括伦理道德和人文精神在内的一切问题,这是十足的“唯科学主义”。有学者说:“唯科学主义(形容词是‘唯科学的’scientistic)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存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sup>⑤</sup>唯科学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产物,以它为方法和准则来评判中国历史文化和建构现代化的各种思想和实践,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论。胡适曾宣称:“我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的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sup>⑥</sup>因此,中国的出路就是全盘西化,“所

①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页。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第114页。

③ 陈新夏:《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201页。

④ 陈新夏:《唯物史观与人的发展理论》,第196页。

⑤ 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⑥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载《胡适文存》四集,第458页。

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sup>①</sup>。傅斯年也曾说:“觉得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固然是荒谬极了;但是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适于我们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是非的问题了。”<sup>②</sup>

这种片面崇尚工具理性的唯科学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危害。因为,作为人文学科的史学包括事实层面的认识和价值层面的理解,事实层面的认识必须要有科学的认识方式,但建立在事实认识基础上的道德情感认同却需要人文的价值判断。因此,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被誉为民国“天才史家”的张荫麟说:“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更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彩(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也。”<sup>③</sup>现代史家陈寅恪基于人文价值理性,对宋学和清学做出截然不同于傅斯年、胡适的评判。他认为,中国文化和学术在宋代达到顶峰。在史学上,“宋贤史学,今古罕匹”<sup>④</sup>，“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sup>⑤</sup>。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宋代史家的长编考异法为后世中国史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更在于宋代学术崇尚民族气节,“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sup>⑥</sup>。以柳诒徵和钱穆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新儒学史家则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传统道德理性的价值及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他们亦对宋代史学和文化予以高度评价,批评清代学术不讲义理和片面追求考据,是中国史学发展的衰退<sup>⑦</sup>。

中国当代人文学术正处于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时期,我们既要充分肯定胡适、傅斯年清学研究的科学观、方法论及其为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要看到其存在的价值理性缺失所带来的严重弊端;同时,要充分吸收诸多中国现代史家重视传统道德理性和人文精神的积极合理因素。只

有将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统一起来,把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密切结合,才能建构起富有中国特色和话语权的当代中国人文学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维视角下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研究”(项目号:12BZS002)的阶段成果。

(本文作者:徐国利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王 贞

- ① 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载《胡适文存》四集,第400页。
- ② 傅斯年:《答余裴山》,《新潮》第一卷第三号,载《新潮》第一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554页。
- ③ 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载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中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35页。
- ④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48页。
- ⑤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9页。
- ⑥ 陈寅恪:《赠蒋秉南序》,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2页。
- ⑦ 参见拙文《新儒学视野下中国传统史学的阐释与建构——柳诒徵的中国传统史学观述评》,(韩国)《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93辑;《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的新书写——以钱穆前期的传统中国史学研究为例》,《河北学刊》2014年第4期。